学术动态

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

罗威廉

数十年来，我们对清代十八世纪的“盛世”，以及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的首次“开放”已了解很多。但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嘉庆朝，大体而言，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1978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收录有曼素恩、孔飞力的《王朝衰落和叛乱根源》，这是研究十九世纪初期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该卷其他大多数文章是对各自研究名作所做的概述，而曼素恩和孔飞力则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新材料，因为他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段基本上被此前英文著述忽视，正因如此，它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文章的权威性造成了此后对此研究的沉寂，因为鲜有学者感到他们能极大改变该文章的结论。

这一研究空白可以理解，但也很令人吃惊，因为嘉庆朝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变期。近来关文发所著的嘉庆皇帝的传记，就将嘉庆皇帝的统治时期径直概括为“从盛到衰”的转折点。[①] 嘉庆朝面临复杂、严重的危机（见下），处处疲玩拖沓：过去轻而易举或例行之事，现在日益难以措办。而且，官场内外——尤其是皇帝本人——明了于此，痛心疾首，并为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而处心积虑。但另一方面，在后世看来，这些人及其社会显得那么安定、祥和——太平天国之后的政治话语中处处充满着怀旧之情，称这一时期是“咸丰以前”已逝的黄金岁月。嘉庆朝官员和士人，也包括嘉庆皇帝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是有干才，有见识，很正直，精力充沛，却又极度忧虑不安。

然而近来，中外学界对于嘉庆朝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这一学术动向（我正在描述的）普遍是要积极重新评价这位新掌权的皇帝及其行政的贡献——少问“他们做错了什么?”多问“他们究竟如何设法让清帝国很好地回归正轨，使得其又存在了一百年?”这一新学术研究的里程碑，是 2010 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由马世嘉组织的一个小组讨论，题目是“重构主权”（reconfiguring Sovereignty），我很高兴担任评议人。除了马世嘉和韩承贤的两篇文章（下面所要讨论的文章就是以此为基础），还有由麦卡弗里的文章《三次叛乱，三种解决之道：清代的国家、教派、社会关系的演进（1774—1813 年）》[②]，以及王文生的《乾嘉变革中的社会危机和“政权内部建设”》[③]。这四篇文章相得益彰，经麦卡弗里和王文生教授惠允，这里我将他们的文章与其他两篇已发表的一起进行评述。如同在小组时评论一样，这里我将少谈各篇文章的贡献，更多的是将它们置于对这一关键变革时期进行全面重新考察的学术研究脉络，探讨它们。

数代人的研究——至少从 1952 年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④]这一极具开创性成果开始，已为我们勾勒出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的种种情形，表明了清王朝命运相当突然且显著的衰落。当时许多人认为存在着人口危机；早在 1793 年，洪亮吉就已写道，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清朝人口已增加了“十到二十

[收稿日期] 2012－05－20
[作者简介]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倍”，而田亩“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三倍五倍而至矣”。其结果必然是马尔萨斯式的通过“洪涝、干旱和瘟疫”抑制人口，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减轻长期的生存危机。[5]堕杀女婴这种“积极的人口抑制”造成了性别比例日益失调，同时趋向没落的男性无力支持家庭，以上两种因素共同造成了一个极令人忧虑的人口问题：就是光棍日益增多。[6]还有一点，曼素恩和孔飞力已做了极好的描述：科举考试中式及官缺的额数，以人均计算日见减少，向上爬的男性找不到回报而身处窘境——这是“后殖民地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人才充斥”（talent glut）。[7]

如果说这种人才充斥是长期繁荣所带来的危机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广泛记述的诸多方面的生态恶化也由此催生。受长江下游商品粮需求日增的刺激，经过数代人对于中游湖岸、河堤的侵占，长江流域——可能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北面的黄河与淮河一样成为人们关注的洪涝来源。经过此前一百年的开垦，山坡地表层土流失，肥力不断下降，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的不满，这是白莲教起义的中心问题所在。[8]乾隆后期黄河失修，造成大运河淤塞，向京城和北部边疆漕粮运输的日益困难。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军事挑战。白莲教战争自然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但还有其他的。例如，湖南、贵州边地的苗民起义，于 1795 年爆发，这意味着该区域数十年来摇摆不定的民族政策最终失败。[9]白莲教运动自身是一场涉及多方面的灾难。教派问题从未被真正查禁，只是驱散而已，在 1813 年及以后再次兴起。[10]另一方面，在平定该运动的过程中，被雇佣、唯利是图的乡勇，为了他们能一直得到报酬，故意将战争延宕多年。而清政府也永久性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自己军队的控制。[11]难以置信的庞大战争开销，将户部在“盛世”积存的盈余一扫而空，中央政府此后不得不用各种令人憎恶的办法临时筹款以平衡收支。[12]在官僚机构内部，正如年轻的改革者包世臣在 1801 年所指出的，每个衙门因顶头上司的需索而拖欠累累。[13]

和珅弄权多年，吏风和官僚办事能力空前低下。1799 年 2 月嘉庆皇帝亲政并令和珅自尽后，没有进一步清除官僚中的和珅同党，从而引起了士人的很大怨言。洪亮吉经成亲王上书——这是著名的事件，其中痛斥了这位新君主的懦弱，洪亮吉开始时被处以死刑，最后被流放，但他成为了年轻、醒悟的一代士人心中的英雄，这些人当时已崭露头角，但事业受挫。[14]洪亮吉绝不是个例：包世臣，尽管支持嘉庆皇帝宽恕文臣中罪恶轻微之人，但也请求对于清朝行政体制进行彻底整饬，嘉庆皇帝不予理睬，但这一请求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却影响了一代改革者。[15]可以说，就现在整个学术而言，将世纪之交时嘉庆皇帝貌似没有勇气澄清吏治，视为最终招致清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从长远观点来看，嘉庆朝被有的学者视为晚清史重大进程，即政治控制从帝国的中央行政机构转移到官僚外的地方精英之手的关键时期。孔飞力在 1970 年出版了关于地方和区域军事化的划时代著作，其中他将“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划在了 1850 和 1860 年代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期，但十年后在为此书所写的反思性序言中，他承认这一意义重大的转折点——还不是军事化，而是地方精英插手赋税征税过程——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嘉庆朝已经发生了。[16]

然而，近来新一波学术研究已开始对嘉庆朝提出了更为积极的看法，强调指出了实际发生的王朝复兴的种种迹象，至少持续了数十年，可能一直到道光萧条和鸦片战争全新的种种威胁的到来。嘉庆皇帝传记的作者关文发本人，从表面上看，是有意回应嘉庆皇帝一百年之后的“晚清改革”，他将嘉庆皇帝的一系列变革，称为“嘉庆新政”。[17]在一篇简短但论证有力的文章中，关文发将嘉庆初年亲政时期的政策调整概括为“咸与维新”，而米丹尼在一篇论证有力的文章中将这一词语，大胆地译作“Jiaqing Restoration”。[18]该词源自当时的话语。这位新皇帝，为恪守孝道，自然会避免使自己公开地偏离已去世父亲的政策与作法。乾隆皇帝去后第一年即嘉庆四年的元旦，国子监祭酒、蒙古旗人法式善（1753—1813），向嘉庆皇帝称贺，为他实行“新政维新”而欢呼，嘉庆皇帝反对这一表述，坚持认为他只是继续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乃父的善政而已，法式善因冒失被革职。但当时其他一些人，包括年轻的亲王昭梿（1780—1833）同样为政治改革兴奋不已，私底里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周围进行的“维新”。[19]

这一新的学术研究，着重强调维新进程数个方面的内容。最基础的是联合一致、旷日持久以及很大程度上成功的宣传活动，这由皇帝亲自组织，将和珅妖魔为“元恶”，将他单独摘出，认为是为数十年贪污和吏治败坏负责之“人”。（这一运动极其成功，以至于今天标准的历史书写仍然受其影响!）当然，个中之意是，除掉了和珅这个人，将带来（且这本身就是）革新。而且这位新君主自始至终也将他本人作为和珅的对立面，亲自重建实政、勤政，以及极为着力强调的“敏政”。[20]“实”、“勤”、“敏”，成为那些年间皇帝言说的基本内容，这位新皇帝，在他长期做太子时，仔细研究过这些词在历史上的意义。嘉庆皇帝写道“虽有良好美意具于方册，而不得奉行之人，则治功不奏；虽得奉行之人，而不励勤敏之志，则庶事无成。”[21]

嘉庆皇帝儿时的老师朱珪（1731—1807），来自有权势的京官、知识分子家庭，他曾被和珅一党贬谪地方（巧合的是，在那里，他发现并资助了年轻的包世臣），嘉庆皇帝登极后，他被召回。在他的指导下，仅仅在乾隆皇帝死后数星期，嘉庆皇帝开始“将和珅建造的地方权力结构毁坏掉”。在1799—1802年的四年间，他任命了43位新督抚，遍及全国各地。在这些事例中，许多情况是，前任官员被这位新皇帝直接罢免。[22]

新皇帝颁行一项严厉禁止官僚体制内部进呈宝物的命令，开展了一场官员崇俭黜奢的运动。通过不进行南巡（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等方式，他将自己树为这种节俭的模范。他也将前往圆明园等夏宫的次数减至最少，并发布禁令，不许在皇城大门内搭台唱戏。

为追求“勤政”和“敏政”，倡导“兴利除弊”，新皇帝在他亲政的头一个月，广开、大开言路，听取来自正式通信体系之外的声音，可谈论民众关心的任何事情。这也变成了某种宣传运动，嘉庆皇帝反复坚持“诏求真言”。对此，新学术研究的看法是，嘉庆亲政初年，确实表现了他是位对于谏言和公开讨论非同寻常宽容的皇帝。他也堂而皇之地为数位敢言之臣恢复名誉，这些人被他已去世的父亲罢官，其中包括御史曹锡宝（1719—1792），他在1786年因弹劾和珅的家人被革职，以及礼部尚书尹壮图（1738—1808），他在1790年指控全国各省藩库亏空累累，百姓遭殃。

作为广开言路的必然结果，嘉庆皇帝恢复了京控制度，即原告若对地方和省里已判决案件不满，可向都察院或步军统领衙门上呈这些案件。这种案件在乾隆后期已开始增多，这促使乾隆皇帝强行限制那些可以受理的案件，1784年，对于没有法律依据的案件的上诉者（绝大多数）进行严厉的处罚。1801年，他的继承人嘉庆皇帝全然改变了这些决定。他将需要听取更多的上诉与肃清和珅时代的罪恶密切联系起来，指出，他尤对涉及官员非法行为以及地方加派沉重赋税的案件感兴趣。他明确将过去限制这种申冤渠道，与暴力叛乱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嘉庆皇帝鼓励更多京控的作法出人意料地成功，在十九世纪头一二十年京控成倍增加，结果，大量案件积压，这促使中央政府将大部分上诉案件退回地方重审。经过长期试验后，创立了一种新的省级机构——发审局，它是隶属于按察司的辅助性质的审判机构，省里一些重要的知府充任其职。近来的研究认为，这对于经费短绌的帝国行政来说是一项痛苦、昂贵的创新，但是至少随着其建立，暴力反抗似乎减少了（嘉庆皇帝本来意图就是如此），并且这是帝制中国晚期朝着发展出独立的司法机构的重要一步。[23]

最后一点，韩承贤在为将要出版的《剑桥中国史》所写的一章的书稿中认为，在嘉庆初年，中央政府的“退却”以及伴随发生的地方精英势力的崛起，大概是政府有意推动，或至少是同意的。他通过三种现象对此进行了解释。第一，是精英投入更大量的经费，用于地方公共事业，国家通过赏赐荣衔以及捐纳等手段，予以刺激。第二，是中央对于地方名宦、乡宦祭祀控制的松懈，这些人的价值的确定，是因为与地方而不是与中央的利益有关。第三，是乡土文献创作的复兴——例如市

镇志的出版，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多，这反映出了1770和1780年代《四库全书》文字狱这样的文字审查的松弛。[24]

似乎人人都同意，嘉庆初年的改革，从短期来看真诚、有效，但并不能阻止清帝国深层次、长期的衰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改革有相对来说长久且更为隐性的影响吗？换言之，若诚如我们所认为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危机是长期的，也是循环的话，那么嘉庆朝廷积极致力于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中国更为长久的近代史有着长期的影响吗？这位积极行事的新皇帝在无意间开启了无法控制的局面吗？例如，嘉庆初年的改革，牺牲了官僚权力，造成了地方精英的长期的权势加重吗？它们带来了一个长久、更为开放的政治言论局面吗？它们帮助了汉民族主义的兴起吗？这些是2010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我们这个讨论小组的参与者所寻求解决问题中的一些。

让我们去了解该小组讨论的内容，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王文生在其发人深思的文章中，探讨了嘉庆皇帝努力“弱化内廷与外朝间的区别”。在确认了和珅弄权的重要工具是军机处和内务府后，嘉庆皇帝很快就对它们的办事程序进行改革。就内务府而言，他寻求结束其人事实际上的终身制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他所任命的内务府官员通常三年一任。他也对于内务府在乾隆后期超大规模增长的做法，以及官员因所谓行政过错而征缴议罪银，予以限制。[25]至于军机处，嘉庆皇帝没有理会士人将其废除的请求，而是寻求将其官僚化、标准化并管制其活动。他首先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他令其至少部分服从于正常的官僚回避制——同一家人不允许同时在军机处任职；他禁止军机处成员身兼某些职位。他废除大学士总理部务的做法，限制军机章京的人数，改革军机处的文书处理程序和通信渠道，极力鼓励军机处对于待定之事向他提供多种意见以供决策，而不是军机处已选出的一种意见。他首次将军机处置于御史的正式监督之下。他恢复了旧有的“九卿”议事形式，从制度上制约军机处的权力。1818年刊行的新《大清会典事例》对所有这些新的规定有详细说明（实际上在世纪之交时已开始实行），该书第一次从法律上承认了军机处的存在。[26]

麦卡弗里在其亚洲协会年会的论文中，探讨了嘉庆皇帝对于教派叛乱态度上的转变。乾隆皇帝的态度，基本上是在镇压1774年王伦起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他对于白莲教起义的镇压初期也持这种态度，那就是，教派自身是问题的根本，必须彻底铲除。这一表述的个中之意是，官员的非法作为不是教派造反的主要原因。嘉庆皇帝采取了近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叛乱的根本刺激原因是对经济的不满，而和珅弄权时猖獗的官员品行不端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对于这些叛乱讨论中，他再三使用“官逼民反”的说法，因此，他对于地方官员更为强硬，而对于那些在叛乱中并不积极的教民，或被认为是盲目跟随他们的头目的人则更为宽容。在1800年的《邪教说》一文中，这位新登极的君主明确表示，追随白莲教叛乱，从本质上讲不是反叛行为，因此，他认为不必进行更大范围的抓捕。正如米丹尼所认为的，“官逼民反”的表述是与嘉庆皇帝更为普遍地宣称对“吾民”有信心相一致，也与他的一贯努力相一致：即尽可能将官府内外的有罪之人，缩小到极少数不可救药者。[27]

韩承贤在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的文章（后加以扩充，即本期所发表的《清前中期对于科考骚乱的惩处》一文）[28]，支持了米丹尼的看法，即嘉庆初年对于持不同意见者非同寻常的宽容。韩承贤集中论述学子罢考事件，在乾隆晚期对于作恶者通常是“从重”处罚，而嘉庆皇帝积极地完全改变了这种强硬手段。同样的宽容也扩展到了罢市的商人，以及拒交赋税的抗议者。这一点从嘉庆皇帝处置那些“任意”笞杖士人的官员的趋势中也可以看出。韩承贤统计分析的结论是，整个说来，“在乾隆朝极可能被处以死刑的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在嘉庆朝都罪减一等”。然而，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对于士人、学子以及商人更大宽容，韩承贤视此乃一个更为持久的趋势，直至道光朝及以后，这造就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言论环境，其中之一，人们可称为准自由（quasi-enfranchised）；对于教民，米丹尼认为，嘉庆初年的宽容，在后期日益被颠覆了，1813年时，皇位面临八卦教的直接威胁，嘉

庆皇帝重新思考他的立场，选择了向教派自身开战。

在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文章及本期所发表的扩充版中，[29]马世嘉赞同韩承贤的看法，认为《四库全书》编纂之后的数十年文字审查逐渐松懈，而在嘉庆皇帝亲政后进一步有意地更为宽容。马世嘉的兴趣是关于中国士人有关内陆亚洲地理和政策的私人著述的研究，他认为乾嘉变革时期是道分水岭，过去的认识即这一著述领域为旗人和朝廷官员所独占的观点应予摒弃，因为从这时起，重印并重新开始了对于以前被查禁的顾祖禹、顾炎武等人的作品的研究，出现了龚自珍等人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著述。正如近来马世嘉在堪称上文的姊妹篇的文章中所写 "随着乾隆皇帝在 1799 年去世，汉族学术精英可以出版关于边疆问题的著述，而不用担心触犯忌讳，大量的研究史料得到刊行。而在此之前，关于边疆的知识基本上是满洲和蒙古行政人员和汉族学者的专属，这些人在任职时能得到相关知识。现在，由于材料的刊行，这一领域向所有士人开放，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30]此外，这个转变延续至道光朝且进一步强化，从徐继畬和魏源的著述特别能看出这一点。马世嘉认为，其结果是汉族精英对于这些边疆地区态度上的极大转变，这些地区，过去被理解为明朝统治时的化外之地，清初时是从外面所强加的满族主导的联盟的组成部分，而现在已被完全理解为是"我们的"。赵刚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集中于术语的研究，认为，尽管清廷在早期的历史中偶尔使用"中国"一词指整个帝国，但在汉族士人看来，"中国"专指原来的"内地"（China Proper，马世嘉称为 little China）；这在十九世纪初发生了极大变化，魏源等学者开始将"中国"等同于整个清帝国（马世嘉的用词是 greater China）。[31]在马世嘉看来（赵刚也是同样），这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共和派革命党人的、看似奇怪的将内陆亚洲包括在中国民族国家之内的想法之滥殇。

能从这些新的、持修正论的著作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小组讨论的组织者马世嘉在向亚洲研究协会的提议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至少在三个方向上"存在"权威和主动权的整体转移"：（1）从满人朝廷到汉人官僚，（2）从中央到区域和地方行政，以及（3）从地方官僚到政府外的精英。诚然，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一揽子主题，但是它一般更是与十九世纪中期叛乱与叛乱之后重建联系在一起的。大体而言，这一新的研究似乎是建议——正如孔飞力在 1980 年所提示的，我们应该将这些新的发展情况的源起向前推差不多五十年，即到十九世纪的头数十年。比孔飞力更向前一步，这一新的研究还认为，这些变化是嘉庆初年朝廷改革政策的有意或者无意的结果。我将此留给我们的读者，判断这一新断限是否有说服力，但我个人是愿意相信的。

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上面已讨论过），孔诰烽和王文生运用了金世杰的"国家崩溃"（state breakdown）的概念作为有用辅助工具，将乾嘉变革置于比较历史的视野之中。金世杰认为十八世纪末是一重要时期，当时数个欧亚古代政权面对着差不多的危机：法国的君主政体，未能应付这些危机崩溃了，而清朝则战胜了这些危机，存活了下来。[32]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嘉庆皇帝发动王文生所称为的从乾隆晚期的国家进行"务实性的退却"（pragmatic retreat）——在前近代技术成本限制下，乾隆晚期的国家已"负担过重"、"难以统治"，并恢复"国家"和社会管理职责间的"平衡"。在孔诰烽的研究中，这给清朝所带来的只是数十年的有效治理，这一时期，他称之为"延迟的政权崩溃"时期。而王文生则向前迈了相当大的一步，他利用嘉庆朝廷自己话语的"守成"概念，赞扬清朝再次进入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时期。

这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在数个方面会引发质疑。例如，有人会认为，在清朝历史上，不是嘉庆皇帝而是其前任乾隆皇帝，进行着最剧烈地缩减政权规模的活动，他扭转了前任雍正皇帝国家建设的许多行动，尤其是在 1748 年前后。[33]也是乾隆皇帝，从 1760 和 1770 年代开始，全身心执着于守成——保持此前皇帝们及自己早期的伟大成就。[34]总之，我以为，认为在嘉庆朝是"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应有大量的证据才能让人信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文章，以及整个新一波、持修正论研究的证

据，的确极强烈地表明：新掌权的嘉庆皇帝及其朝廷多方面的积极行动，在清帝国的历史上以及“中国”从中产生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长远的影响。（师江然译）

＊ 本文“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刊于美国 *Late Imperial China*，Vol. 32，No. 2（December 2011）：74—88. 本文是《清史研究》与 *Late Imperial China* 的交流文章，翻译得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① 关文发 《嘉庆帝》，30 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

② Cecily McCaffrey， “Three Rebellions， Three Resolutions: The Evolution of State/Sect/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1774—1813.”

③ Wensheng Wang， “Social Crises and ‘Inner State Building’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④ 该书由燎原书房出版。

⑤ 洪亮吉关于人口的著名文章由刘广京（K. C. Liu）翻译，收入狄百瑞、陆冬远编《中国传统资料选编》（Wm. Theodore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Second Edition，Volume Tw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174—176 页。关于洪亮吉思想及其背景，见关文发《嘉庆帝》，188—194 页。

⑥ 李中清和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James Z. Lee and 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47—51 页；泰尔福特 《清代的家庭和国家》（Ted A. Telford. “Family and State in Qing China: Marriage in the Tongcheng Lineages，1650—1880.” In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 2.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992.）。苏成捷 《性、法律和社会》（Matthew H. Sommer，*Sex，Law，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2—15 页及全书各处。

⑦ 曼素恩、孔飞力 《王朝衰落和叛乱根源》（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0，Part 1，e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107—62.），113—116 页。

⑧ 魏丕信《中国水利的周期：以 16 至 19 世纪的湖北省为例》（Pierre-Étienne Will， “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 la province du Hubei du 16ème au 19ème siècl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68 [1980]: 261—87.）；濮德培 《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的治水》（Peter C. Perdue，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 [August 1982]: 747—65.）；罗友枝 《汉江丘陵地带的农业发展》（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an River Highlands.” *Late Imperial China* 3.4 [December 1975]: 63—81.）。

⑨ 苏堂棣 《十八世纪的族性和苗疆》（Donald S. Sutton，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ed. 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F. Siu，and Donald S. Sutton，190—22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⑩ 韩书瑞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⑪ 戴莹琮 《平民进入战场：白莲教战争中的乡勇》（Yingcong Dai， “Civilians Go into Battle: Hired Militias in the White Lotus War，1796—1805.” *Asia Major* 22.2 [2009]）。

⑫ 白莎 《筹措经费的战争：卖官与中国十九世纪的省际财政》（Elisabeth Kaske， “Fund-Raising Wars: Office Selling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1.1 [2011]: 69—141.），90—92 页。

⑬ 罗威廉 《改写清朝的政体：包世臣的〈说储〉》（William T. Rowe， “Rewriting the Qing Constitution: Bao Shichen's *On Wealth*.” *T'oung Pao*，forthcoming.）。

⑭ 洪亮吉上书的译文，见狄百瑞、陆冬远编《中国传统资料选编》，172—174 页。关于此事的研究，见曼素恩 《洪亮吉》（Susan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1746—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1.）。受洪亮吉影响的年轻一代的士人，见波拉切克 《内部的鸦片战争》（James 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92.）。

⑮ 罗威廉 《改写清朝的政体：包世臣的〈说储〉》。

⑯ 孔飞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Philip A.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Paperback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⑰ 关文发 《嘉庆帝》,113—114 页。

⑱ 可参见“同治中兴”的英文通行译法“Tongzhi Restoration”。——译者注

⑲ 张玉芬 《论嘉庆四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49—54 页;米丹尼 《王朝衰落、和珅以及咸与维新的意识形态》(Daniel McMahon,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38.2 [June 2008]: 231—55.);昭梿,见盖博坚 《清代的巡抚及其省份:中国疆域行政的演进(1644—1796 年)》(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139 页。

⑳ 米丹尼 《王朝衰落、和珅以及咸与维新的意识形态》。

㉑ 关文发 《嘉庆帝》,103 页。

㉒盖博坚 《清代的巡抚及其省份:中国疆域行政的演进(1644—1796 年)》,141—142 页。

㉓ 关于京控过程的经典研究是欧中坦的《千方百计上京城》(Jonathan K. Ocko, “I'll Take it all the Way to Beijing: Capital Appeals in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2 [May 1988]: 291—315.)。近来对于此制度的更多研究,见张世明、冯永明 《包世臣正义的成本:晚期发审局的法律经济学考察》,《清史研究》, 2009 年第 4 期;方强 《困境:从上古到晚清的中国上诉制度》(Qiang Fang. “Hot Potatoes: Chinese Complaint Systems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Late Qing (189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4 [November 2009]: 1105—36.);孔诰烽《文化的正统性、京控和延迟的国家崩溃》(Hung, Ho-fung. “Cultural Legitimacy, Capital Appeal, and Delayed State Breakdown in Qing China, 1805—1839.” Unpublished paper.)。

㉔ 韩承贤 《乾嘉变革》(Seunghyun Ha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forthcoming.)。嘉庆朝卖官的扩大及地方分权,也见白莎 《筹措经费的战争:卖官与中国十九世纪的省际财政》,90—92 页。

㉕ 十八世纪后期“议罪银”的发展,见张婷 《“议罪银”和乾隆朝的处罚政治》(Ting Zhang, “‘Penitence Silver’ and 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6).” *Late Imperial China* 31.2 [December 2010]: 34—68.)。

㉖ 最后一点,也见盖博坚 《清代的巡抚及其省份:中国疆域行政的演进(1644—1796 年)》,142 页。士人赞成完全废除军机处的情绪,见罗威廉 《改写清朝的政体:包世臣的〈说储〉》。

㉗ 米丹尼 《王朝衰落、和珅以及咸与维新的意识形态》,249 页。

㉘ “Punishment of Examination Riots in the Early to Mid-Qing Period,” *Late Imperial China*, 32.2 (December 2011): 133—65.

㉙ 马世嘉 《乾嘉变革时期士人重写中国》(Matthew W. Mosca “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Late Imperial China* 32.2 [December 2011]: 89—134.)。

㉚ 马世嘉 《帝国与边疆知识的传布:清朝对于奥斯曼的认识》(Matthew W. Mosca,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2010], 147—207.), 151 页。

㉛ 赵刚 《重新发现“中国”:清帝国的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民族身份的兴起》(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1 [January 2006]: 3—30.)。

㉜ 金世杰 《早斯近代世界的革命与叛乱》(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4—5 页。

㉝罗威廉 《救世:陈宏谋和中国十八世纪的精英意识》(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㉞马钊 《反基督教运动与中国十八世纪的国家控制》(Zhao Ma,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5.1 [December 2004]: 18—20.)。